

TULUFAN CHUTU WENSHU YANJIU

吐魯番

王啓濤 著

出土文書研究

吐魯番學正在成爲與敦煌學媲美的又一世界顯學。本書主要是對吐魯番出土文書的研究方法進行開拓性研究。同時，作者還對吐魯番出土文書進行全面校勘和識讀，總結其方法，運用吐魯番出土文書與地面傳世文獻進行相互對照校勘。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王啓濤著

吐魯番

出土文書研究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吐魯番出土文書研究 / 王啓濤著. — 成都: 巴蜀書社, 2005. 4
ISBN 7-80659-692-5

I. 吐... II. 王... III. 古書契—研究—吐魯番地區
IV. K87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17421 號

策劃編輯 何志華
責任編輯 何志華
封面設計 李文金

吐魯番出土文書研究

王啓濤 著

| | |
|------|---|
| 出 版 |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
| 網 址 | www. bsbook. com |
| 發 行 |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
| 經 銷 | 新華書店 |
| 印 刷 | 成都金龍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電 話:(028)85651045 |
| 版 本 |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
| 版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成品尺寸 | 203mm×140mm |
| 印 張 | 14. 625 |
| 字 數 | 354 千字 |
| 書 號 | ISBN 7-80659-692-5/K·110 |
| 定 價 | 32. 00 圓 |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
學術叢書第二輯編委會

名譽主任 鍾仕倫
主 任 李 誠
副 主 任 鄭英樹 李 凱 唐小林

委 員（以姓氏筆劃爲序）

李天道 吳明賢 周及徐 馬正平
萬光治 曹萬生 楊亦軍 劉永康
劉朝謙

作者簡介

王啓濤，一九六五年生，男，漢族，四川儀隴人。博士、教授。二〇〇二年七月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畢業，獲文學博士學位，同年進入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做博士後。現為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敦煌吐魯番學、漢語言文字學。出版專著六部：《魏晉南北朝語言學史論攷》（巴蜀書社）、《天漢精神》（四川教育出版社）、《中古及近代法制文書語言研究——以敦煌文書為中心》（巴蜀書社）、《吐魯番出土文書研究》（巴蜀書社）、《吐魯番學》（巴蜀書社）、《吐魯番出土文書詞語攷釋》（巴蜀書社）。在《中國語文》、《中國史研究》、《古漢語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等國內外重要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六十餘篇。目前主持承擔的項目主要有：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吐魯番出土文書語言研究》、中國博士後科學技術基金項目《吐魯番出土文書詞彙研究》、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吐魯番出土文獻導論》、四川省教育廳重點項目《巴蜀口語文獻語言研究》。科研成果曾獲四川省人民政府哲學社會科學三等獎。

總 序

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成立已近七周年了。回憶建院之初，可謂筭路藍縷，百廢待舉。生計尚且艱辛，何談科研！然而就在此際，我們却依靠“化緣”而來的一點經費，設立了“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青年科研基金”，並制定了《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科研獎勵條例》，從而啓動了文學院科研新的里程。

近七年來，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已經成長為擁有三系五所、六個本科專業、十一個碩士授權點含八個二級學科點、二個獨立招生的三級研究方向和一個專業碩士點的科研教學實體。教學規模的擴大，意味着教學任務的日益繁重，然而可喜的是文學院的廣大教職工，尤其是中青年教職工却敏感到科研較之以往更加重要。因為教學中科研含量比重越高，就越能從根本上提高教學質量，這也正是學校“在做大的基礎上做强”的戰略方針實施的保證。於是他們在繁重的教學工作之餘，讀博士，搞科研，開創了中文系—文學院有史以來令人欣喜、最為繁榮的科研局面。《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學術叢書》與《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研究生系列教材》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於二〇〇一年應運而生。

《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學術叢書》是一種在文學院所屬專業之內、不拘形式的叢書，凡屬文學院教師所著且受文學院出版資助的學術性專著皆在其列。《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研究生系列教材》則以二級學科碩士授權點為單位組織編寫。我們希望文學院所屬各二級學科碩士授權點將來都能認真編寫一套適合自己學生的、反映出自己專業水平和特色的教材，這也是提高研究生教學質量、規範培養規格和模式的有效途徑。

近七年來，文學院隨着自身經濟狀況的改善，逐步加大對科研的投入，最近兩年的年投入額皆在四十萬元以上。在學校的關懷和出版部門的支持下，《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學術叢書》、《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研究生系列教材》兩種叢書第二批又開始出版，顯示了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的科研又跨上了新的臺階，我們有理由對未來更加充滿信心。

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
二〇〇四年九月

前 言

吐魯番出土文書被譽為高昌歷史的秘密資料庫、西域文化的地下博物館、研究中國中古歷史與文化的百科全書^①。吐魯番出土文書在許多方面的價值不遜於敦煌文書。首先，吐魯番文書的發掘早於敦煌文書。從一八九八年開始，俄國探險隊在吐魯番古寺廟遺址劫走古寫本經卷，後來，俄、德、英、日等國學者亦來此帶走了大批漢文和民族文字的寫本文書；而敦煌文書的大量發現是在一九〇〇年左右。其次，吐魯番文書的時代上限與下限都超過敦煌文書，綿延的時間更長。在吐魯番文書中，最早者為吐峪溝寺廟遺址所出寫有“元康六年（二九六）三月十八日寫已”題記的《諸佛要集經》殘卷（現藏日本），最晚者是元代的文書，如高昌古城所出《至元十七年（一二八〇）善斌賣身契》三種。整個盆地所出也以十六國至高昌和唐前期的文書為大宗^②，而敦

① 參攷王燦《故國尋夢——高昌》，雲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第一一五頁。

② 陳國燦《敦煌吐魯番文書與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收入《敦煌學史事新證》，甘肅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煌文書中出土的紀年最早的社會文書是《西涼建初十二年（四一六）正月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里籍》（現藏倫敦，編號為斯一一三）。另外，吐魯番出土文書在內容上比敦煌文書“更加豐富多彩”^①，吐魯番文書的價值可能相同於或者高於敦煌文書。童丕指出：“敦煌寶藏從整體上來說，是來自寺院圖書館，或者說藏經洞。因而所反映的世俗特徵很不明顯。這與吐魯番文書的情況不一樣。”^② 所以，吐魯番文書“其內涵因時代的不同而較敦煌寫本更為豐富。所獲文書正好補充了敦煌文書中北朝隋唐世俗文書的不足，也為吐魯番本地保存了連續的檔案記錄”^③。正是由於以上原因，吐魯番學已經成為與敦煌學媲美的又一世界顯學^④。然而，也正是由於吐魯番出土文書大量來自民間，其中充滿大量的俗字和俗語詞、口語詞，同時，由於其中還有許多行政公文，充滿大量術語詞，並且具有文體的固定格式和詞彙特徵，這就給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正確釋錄帶來鉅大的困難。前賢時彥在這一方面做出了許多努力，功不可沒。但由於不少學者不是專門從事語言文字研究，精力有限，所以對吐魯番出土文書的俗字、俗語詞、術語詞不得其解和解釋錯誤的現象，比較突出。這不僅較為嚴重地影響到吐魯番學的研究和應用，而且影響了漢語史的研究。前賢時彥對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拓荒與整理功不可沒，但留下的問題有四：一、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整理者往往對大量的俗

① 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第一四四頁。

② 童丕著、余欣、陳建偉譯《敦煌的借貸——中國中古時代的物質生活與社會》，中華書局二〇〇三年版，第六〇頁。

③ 榮新江《敦煌學新論》，甘肅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第二七七頁。

④ 參攷王炳華《訪古吐魯番》，新疆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第一八六頁；王嶸《故國尋夢——高昌》，雲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第四頁。

字、俗語詞和術語不得其解而誤錄、誤釋和誤注，從而造成大量學者在引用吐魯番出土文書時的文字和詞彙硬傷，造成郢書燕說，南轅北轍。同時，由於吐魯番出土文書閱讀的文字與詞彙難度，許多領域的學者常常不參攷和閱讀原卷或原卷圖片，從而使整理者的釋錄錯誤得以蔓延。二、漢語史學者對吐魯番出土文書的研究不足，從而使中古漢語和近代漢語失去了寶貴的語料，在斷代研究方面斷了一條寶貴的“鏈”，而斷代史研究是通史研究的基礎，“鏈”的缺乏，將損害整個漢語通史研究的完整性與科學性。三、漢語各類詞典的編纂由於缺乏對吐魯番出土文書的重視與研究，在編纂詞典時對這一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往往忽略，從而影響了辭書的編寫質量。四、對吐魯番出土文書這樣的應用文書，從體裁角度來攷察其語音、詞彙、文字的風格不同，這一點前賢時彥似乎從未做過，而這一點對於敦煌吐魯番學與漢語史研究都是極為重要和迫切的。所以，對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文字和詞彙進行全面而扎實的研究，將給從各個領域研究吐魯番出土文書的學者完成一項基礎性的工作，這種工作雖然樸實而艱辛，但卻勞苦而功高。

二〇〇二年十月，我從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畢業獲得博士學位後，前往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投張涌泉教授門下從事博士後研究。在確定博士後研究課題時，張師說：“你就做吐魯番出土文書這一塊如何？你在博士階段做的課題是敦煌法制文書，應該有這個基礎。”實際上，張師對吐魯番出土文書的研究一直非常看重，這可以從後來他為我申報填寫的《第三十四批博士後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申請表》所寫的推薦意見中看出：“近一個世紀以來，在新疆吐魯番地區出土了大量唐代前後的寫本文書，這些

文書，未經後人校刻竄亂，保存着當時寫本的原貌，是研究當時語言的非常珍貴的‘同時資料’。特別是其中大量的案卷契約等民間文書，更是研究當時活的語言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吐魯番出土文書語言的研究至今還沒有人系統地做過，這不但是漢語史研究的一個缺陷，而且也對這些文書的整理研究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更為可惜的是，不少學者由於在語言文字學上特別是俗字、俗語詞以及近代漢語上的功力有一定限制，從而存在較為突出的、對吐魯番出土文書進行誤讀、誤斷、誤釋、誤校和誤注的現象，王啓濟申報的課題《吐魯番出土文書詞彙研究》從吐魯番出土文書原卷或原卷圖片入手，擬從語言文字學角度，第一次對迄今出土的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文字與語言（包括語音、詞彙、語法）進行全面而系統的釋讀、整理、攷釋和研究，為從各個角度研究吐魯番出土文書的學者提供一個比較扎實可靠的吐魯番出土文書釋讀文本。同時總結吐魯番出土文書文字與語言的攷釋方法，這將有力促進吐魯番學的研究，並對漢語史研究和詞典編纂起到重要作用，填補吐魯番學和漢語史研究的一片空白。”這一課題也引起老一輩學者的關注。張永言教授在《推薦書》上寄予很大的期望：“王啓濟教授一九九九至二〇〇二年在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從董志翹教授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後又到浙江大學敦煌吐魯番學研究中心從張涌泉教授做博士後研究，他的博士論文和博士後課題均是以敦煌吐魯番法制文獻為研究對象，近年來發表的論文也集中在敦煌吐魯番學研究方面。在研究的時候，他非常注重對出土文獻資料的覈對、釋錄，以保障語料的準確性。同時，對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的術語詞、口語詞、俗語詞和俗字以及文書語體特徵等都進行全面而系

統的研究，這一研究對漢語史研究非常必要。王啓濤教授具有良好的外文基礎，善於吸取海內外學者在這一領域的成果，且學習和工作非常勤奮扎實，現在他申報《吐魯番出土文書詞彙研究》，將對海內外能夠收集到的吐魯番出土文書的語言和文字進行全面而系統的研究，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也非常重要的工作，相信他一定能夠取得預期成果，因此我樂於鄭重推薦。”而我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導師董志翹教授也在《推薦書》裏給予殷切鼓勵：“相對於敦煌文書研究來說，吐魯番出土文書研究一直比較薄弱。而以往一些研究吐魯番出土文書的著作，從語言的角度入手蓋寡。因對文書中的俗字、俗語、術語措意較少，在文本識讀整理方面存在相當數量的問題，這對吐魯番學和漢語史、漢字史研究都是極為不利的。王啓濤同志所申請的課題《吐魯番出土文書詞彙研究》，將直接從吐魯番出土文書原卷或原卷圖片入手，從語言文字學角度對迄今發現的全部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文字與詞彙進行全面而系統的研究。課題將這一時期的詞彙與文字置於當時廣闊的人文、歷史背景之下，既有疑難字詞的攻索，又有常用詞、構詞法、詞彙系統演變的宏觀研究，具有開創意義。”

二〇〇三年，我在吐魯番出土文書方面的一個研究課題《吐魯番出土文書詞彙研究》被批准為第三十四批中國博士後基金資助項目（文科最高等類資助）。二〇〇四年，我申請的另一項吐魯番出土文獻研究課題《吐魯番出土文書語言研究》被批准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同時，《吐魯番出土文獻導論》被批准為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這些，都充分體現了本領域的專家和師長們對我所從事的工作的支持，我在對他們表示衷心感謝的同時，也深感責任重大，決心傾注所有的時間和

精力，在吐魯番學的探索和研究上有所進展，以不辜負師長們的期望。

目前呈獻給各位的這本拙著——《吐魯番出土文書研究》，便是以上課題的一個階段性成果。

本書除《前言》外，共分六章。茲對各章內容做一個簡要介紹。

第一章《吐魯番出土文書——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歷史與文化》。主要論及吐魯番出土文書的世俗價值。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撰寫者、文書中的主人公、文書的閱讀者和交流者往往都是平民百姓和下層官吏，所反映的實際內容和所運用的語言文字都具有濃厚的民間色彩。通過這些文獻，往往可以看到一個更加生動活潑、真實全面的世界，這些文獻可以對傳統正史文獻進行補充和更正，甚至可以據此重寫歷史或者重寫歷史鏈條上的某些片段。同時，由於這些文獻千百年來長眠於地下，沒有像不少傳世文獻那樣經過後世傳鈔者的篡改和增刪，非常原始和忠實地保存了當時、當地、本人的語言文字記錄，因此完全可以用來校勘傳世文獻。同時，由於吐魯番地區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重鎮，是來自四面八方的商賈遊客匯聚的地方，更是東西方文化特別是漢文化與異族文化、異質文化進行交流、滲透和融合的地方，作為那樣一段漫長時間、那樣一個廣闊舞臺、那樣一批來自不同民族的人群的文字記錄，吐魯番出土文書全面而直觀地反映了當時世界主要文化的鮮明特色和具體風貌。吐魯番地區出土了大量的漢文文獻和非漢文文獻，這些非漢文文獻包括梵、佉盧、粟特、突厥、于闐、龜茲、焉耆、波斯、敘利亞、吐蕃、回鶻、西夏、蒙古等民族的文字與文獻。因此，吐魯番出土文書堪稱當時人類文明的一

部百科全書。

第二章《吐魯番出土文書與敦煌文書研究》，主要將吐魯番出土文書與敦煌文書進行相互觀照和研究。吐魯番出土文書與敦煌文書的關係至為密切。實際上，一些吐魯番文書本來就是來自敦煌^①。另外，高昌之得名，可能就來源於敦煌郡之高昌里。此外，不僅代表漢朝治理西域屯田的“總督”戊己校尉是由河西走廊的涼州或者敦煌就近選派的，而且高昌壁一度也是敦煌郡高昌里派出之士卒的駐地，而高昌壁的正式設立，應在由敦煌派出的戊己校尉到任之時或稍後。而且，從地理位置看，高昌距離通向敦煌的“新道”非常近^②。此外，從行政管理角度看，高昌與敦煌關係也極為密切。東晉咸和二年（三二七），河西地區崛起的張駿前涼王朝攻佔高昌，置高昌郡，這個郡成為沙州（敦煌）之下的地方政權。另外，在藝術風格上，兩地亦多相近。在吐魯番地區吐峪溝東面一座殘窟中保留着一幅佛本生故事畫和一些漢文榜題，這種榜題的書法風格與敦煌莫高窟晉、十六國時期卷子中的書體如出一轍^③。而敦煌地區的文獻也多涉及高昌地區，如一部保存在敦煌莫高窟的文獻《西州圖經》殘本，就記載高昌地區吐峪溝佛寺并稱其為“丁谷寺”。而高昌地區的領袖人物亦常常來自敦煌，如公元四八八年，出身敦煌名門的張孟明成為高昌王。公元四九六年，又是同樣來自敦煌的馬儒為高昌王。另外，

① 參攷唐長孺主編圖錄本《吐魯番出土文書》“前言”，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如七二 TAM 二三〇；四七（a）《武周沙州敦煌縣田畝帳》上蓋有“敦煌縣之印”，即為敦煌文書之流入西州者。

② 王燾《故國尋夢高昌》，雲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第二二頁、第二四頁。

③ 同上，第四〇頁。

從歷史文獻看，敦煌和吐魯番從來在戰略上緊密相連，吐魯番成了不少人在敦煌敗走之後的逃難所^①。所以，研究吐魯番出土文書實際上也就是在研究敦煌甚至整個中古和近代漢文與非漢文文書。研究了吐魯番出土文書的語言文字，也就研究了中國中古和近代的語言文字。將敦煌文獻與吐魯番出土文獻相結合，可以用來校勘傳世文獻，同時為前賢時彥在敦煌文書研究中的得與失提供重要的佐證和辨正。

第三章《吐魯番出土文書與辭典編纂》，主要揭示吐魯番出土文書的詞典編纂價值。前賢時彥在編寫各類字典詞書時，要麼由於其生活時代早於吐魯番文書的出土時代，要麼由於忽略吐魯番出土文書的語料價值。因而，在目前的各類詞書中，甚至包括《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大詞典》這兩部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字、詞典，都極少甚至沒有使用吐魯番出土文書的語料。因此，從字典與詞典編纂角度，對這批文書的語料進行全面發掘和使用，迫在眉睫。吐魯番出土文書的語料價值，主要體現在：彌補大量新詞、補充大量義項、更正字典辭書的錯誤、提供不少實際語例。同時，吐魯番出土文書也是漢語史和漢字史研究的重要語料。尤其是其中的口語詞、俗語詞、術語詞和俗字，更是研究中古漢語與近代漢語以及近代漢字的珍貴語料。

第四章《吐魯番出土文書與古文獻整理》，主要運用吐魯番出土文書校勘地面傳世文獻，同時，對前賢時彥在各個領域裏運用傳統語料進行校勘和訓詁時所存在的可商榷處進行補苴和更

^① 還可以參攷今人岑仲勉《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第四八〇至四八一頁。

正。

第五章《吐魯番文書中文字的繁化、簡化、省略、通假與異體現象》，主要論及吐魯番出土文書中的頗具特色的文字現象。包括繁化、簡化、省略、通假、異體，並分析了造成這些特色文字形式的原因：或由於前後文字字體的同化與類推，或由於鈔寫者圖求簡便省事以及經濟類文書對數字表達的固有要求等，都可能造成這些文字現象的產生。

第六章《唐長孺主編圖錄本〈吐魯番出土文書〉獻疑》，主要就唐長孺先生主編圖錄本《吐魯番出土文書》在錄寫、注釋、標記、標點吐魯番出土文書的語料方面的可商榷處進行討論和辨正。主要涉及俗語詞、俗字、術語詞、通假、寫本符號與書寫習慣等方面的內容。

在從事敦煌吐魯番學和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過程中，我一直有一個感受，就是要向史學家們借鑒一些思想、理念與方法，而這一方面最令人敬仰的學者就是梁啟超。我們將在這本小書中多次引用梁啟超所倡導的研究方法來從事敦煌吐魯番學和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時下學術界倡導學術研究要既重視材料又重視理論與

方法，這一方面史學家們着力甚多^①，而其先驅人物即為梁啟超。許冠三也指出：“史建學派堪稱‘新史學’中的‘新史學’。從盡舍多派之短兼取各家之長着眼，這一派的學人確認，現代史學的要務，不外史實真相的重建、史情活態之再現、人類往昔行為之解釋，以及古今社會變革之說明。其得失樞紐，首推歷史因果連鎖的追尋與掌握；其成敗關鍵，端在各類學理、通則、概念以及相干方術與材料的恰當運用。至於研究的擴張與突破，或緣材料發現，或由理論啓發，或因方法革新，實因人因世而異。然統合言之，材料、方法和理論這三者，既無一可以偏廢，亦無一可以獨行。”“他們重理論，但不盲從理論，更不以一論選材料決事實是非。他們重方法，但不迷信方法，亦不專主一法。他們重材料，但不挾材料以自炫。更不假定材料的攷證與詮釋已盡史學之全功。這一派學人極少公開稱引梁任公，不過，他們所信持的準則，實際有一部分早見於梁的史學新義之中，理論、方法和

^① 如余英時對近年來史學界的史料學派的評論，就值得我們參攷。余英時指出：“史料學派不但誤認一切基本事實為歷史事實，而且對每一事實復儘量作孤立的處置。因此他們主張‘證’而不‘疏’。在‘史學即史料學’的理論支配之下，他們的‘證’的範圍則退縮到材料的真偽這一點上。在這種情形下，真正的史學研究是無從開始的。近幾十年來史學的一般發展使我們認識到，歷史事實之所以成為歷史事實，是和史學家對它的了解分不開的。歷史事實無窮，相對於任何一項歷史上的變化與發展而言，史學家經過反覆的研討，纔在衆多的歷史事實之中發現它們之間主從輕重的複雜關係。發現這種關係便是對歷史現象作出了最卓越的解釋。《書經》所謂‘疏通遠’，司馬遷稱《史記》的目的在‘通古今之變’，其中心的涵義即在於是。所以我們雖然同情史料學派對‘證’的強調，但是卻絕不以此為史學的止境。今天史學家一方面要用最嚴格的實證方法來建立史料，另一方面則要通過現代各種學科的最新成果和時代的眼光來‘疏通’史實與史實之間的關係。”參攷余英時著（李彤譯）《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第七八頁。